



代序 阅尽沧桑,读史明智

钱 穆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后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



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须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而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此种通史,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天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



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今于国史,若细心稽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



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抔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抔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抔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抔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抔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



目 录

序言 阅尽沧桑,读史明智	1
--------------	---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黎明

第一节 商代文化速写	3
第二节 历史与传说之间	12
第三节 周的兴起	16
第四节 周朝的外族	21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29
第二节 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	32
第三节 庶民的形成与抗争	35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39
第五节 婚姻中的女性等级	43
第六节 士的性质及其演变	45
第七节 宗教与祭祀	50
第八节 卿大夫势力的扩大	55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	59



第三章 霸国与霸业

- 第一节 楚国的兴起 65
- 第二节 齐国的发展(附宋) 68
- 第三节 晋楚霸业的交替 72
- 第四节 吴越世仇之争 78
- 第五节 郑子产之兴国 82

第四章 孔子和他所处的时代

- 第一节 周礼在鲁的传承 89
- 第二节 孔子品德的养成 91
- 第三节 乱世之下的孔子 94
-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实践 98
- 第五节 孔子的教育事业及其晚年 104

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 第一节 卿大夫的弑君僭越 113
- 第二节 李悝和吴起的变法 117
- 第三节 秦国的图强之路 120
- 第四节 经济和战争的演变 125
-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 130

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 第一节 新知识阶级的兴起 139
- 第二节 墨子与墨家思想 142
- 第三节 孟子、许行及《周官》 149



第四节 杨朱、名家和道家学说 156

第五节 阴阳家和法家的形成 160

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第一节 吕不韦与嬴政 169

第二节 六国统一于秦 172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管 175

第四节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181

第八章 秦广汉兴之际

第一节 陈胜、吴广之起灭 189

第二节 项羽与巨鹿之战 193

第三节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197

第四节 项羽入关中的经过 201

第五节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205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第一节 从分封到郡县的回归 211

第二节 中国与外族的交往 216

第三节 汉武帝抗击外族的事业 220

第四节 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228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黎明







第一节 商代文化速写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 1899 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现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有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



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耕种全用人力。农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甲骨拓片。商代甲骨最早发现于安阳小屯村一带,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外,还有象。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外,还有狗。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的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鏃、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绚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孟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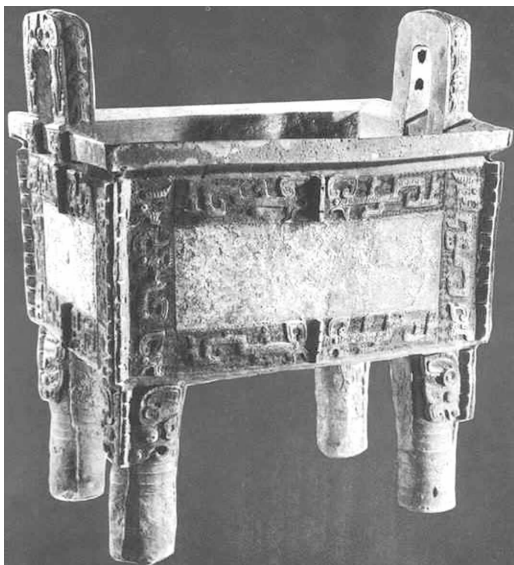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鸛、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



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鸛、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一绿



商代司母戊方鼎，我国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头发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在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几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形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



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

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可惜后者的资料远不如前者的详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所以后来商朝亡后,新朝把商遗民分派给新封的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给鲁国;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分给卫国。卜辞记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战的。例如‘令旂族寇周’;‘令多(众)子族从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



商代的陶器



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者,溯生之所从来也。(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无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邻。卜辞里每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



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



商代跪坐玉人

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但那不是常见的事。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又有所谓‘藉臣’和‘小藉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书包涵单字约五千，可识的约一半。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



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其意义及用法大体上与今字不殊,习惯的保守性真是可惊的。除形体外,甲骨文字与今字的差异有两点可注意:(一)带有图像性的字无论物体的写生或动作性态的喻示,每随意描写,但求肖似,没有定构。例如龟字,或画正面,或画侧面,或画尾,或不画尾,或画两足,或画一足。又如渔字,或画一鱼,一网,一手 或只画一鱼,一手。或画四鱼在水中 或画一鱼傍水。(二)在意义的分别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为详细。例如驾驭之驭,或从马,或从象,因所驭不同而异字。又如牧字,或从牛,或从羊,因所牧不同而异字,又如一兽的雌雄,各有异名 牝牡二字原指牛的两性,此外马、羊、豕、犬、鹿等,各于本字的边旁或底下加匕或土,以别雌雄。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所字,像竹简汇集之形。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

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前后对臣民三次训话的。

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



商代后期的容酒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